

评论

邱贵芬

这两篇论文处理的题材虽然大不相同【编按：纪慧文的论文已于1997年3月出版为《12个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唐山），本次不再收入】，可是基本上有一个重要的共通点：两篇论文采取的辩证策略十分类似，建立威权言说 vs. 被压抑的声音。两篇论文一开始都先建立一个学者专家权威言说叙述 vs. 讨论对象（上班小姐、学生）被消音的状态的二元对立，接着都主张解放被压抑的声音（上班小姐、学生）。在这样的理论架构里，专家学者的叙述和言说——如〈十二个上班小姐的故事〉里妇女救援机构的「救赎论述」（认为上班小姐都是父权体制的受害者，等待社会的拯救以脱离火坑）和〈迈向多元化教育视野下的性教育〉里的专家学者主张的性教育——都被视为在巩固主流价值体系，而上班小姐本身和学生本身对「上班」、「性」的看法似乎都被视为具有较高程度的颠覆力，搬上台面可以与主流叙述所欲营造的「迷思」抗衡。

在〈十二个上班小姐的故事〉里，代表主流言说的是救援机构，被压抑的声音是「上班小姐的心声」。纪慧文认为「救赎叙述」是主流媒体在呈现这些上班小姐的论述最主要的特色：主流媒体和救援机构在叙述「上班小姐的故事」时，通常认为这些小姐都是等待救赎的受害者。相对于这样的论述再现，纪慧文强调我们应该听听小姐自己的声音。本篇论文和〈迈向多元化教育视野下的性教育〉一样，想摆脱女人为受害者的论述思考，强调上班小姐的自主能动性（agency）。纪的论文暗示，使上班小姐成为受害者的，不是所从事的行业，因为在上班场域，这些小姐其实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女孩和客人之间有某种平等多元的关系」；论文似乎认为这样的谋生方式对女人没有什么不好，最大的杀伤力反而是社会媒体力量和各种管束机构合力对从娼者的「污名化」。

「污名化」这个道德判断的问题当然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上班小姐」是否该承担那么大的社会道德压力的确有待商榷。不过，针对论文主要的理论假设，「自己的声音」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心声？「上班小姐」自己的声音是不是一定较具颠覆性？社会救援机构的「救赎论述」是不是不过是主流社会所散布的迷思？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我想妇运可以休兵——女性主义论述难道不也是一种「救赎论述」，认为这个运动是在为女人争取权利福利，而多数的女人其实并不领情，认为女性主义论述视父权体制下女人为受害者的种种抗争做法，徒掀起社会无谓的风波，增加家庭纠纷？「自己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的声音？是贴近、巩固主流父权机制的运作？还是具有颠覆父权体制的高度潜能？这是必须更细腻思考的问题。

另外，纪的论文一再强调「上班小姐」从事此行业所感受到的愉悦。我认为讨论此类行业的愉悦，必须把年龄差距和经济层面的问题放进来讨论。事实上，论文附录的上班小姐的故事里，上班小姐现身说法谈她们的工作时，愉悦的问题似乎并没有那么被重视或强调。我们反而看到极强烈的经济压力和金钱焦虑。在许多故事里，「不趁现在还可以赚、不赚些怎么成？」这句话一再出现。在这里，阶级的因素不容忽视。这些故事里的上班小姐大多来自社会下层阶级，选择上班这个行业其实纯考量愉悦层面的人很少。阅读附录的许多案件里，我们一再看到「为了尽孝道」，「拿钱回家」是这些小姐选择上班小姐生涯的重要因素。

要颠覆主流媒体呈现的上班小姐都是受害者、都等待救赎的叙述，单单强调上班小姐的「自主性」、「能动性」，如果主要论证是基于她们面对客人所展现的不是任客人予取予求的关系，这样的论点说服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问，这些上班小姐选择这个行业，

阶级和她们的经济位置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她们上班所赚来的钱又是如何支配的？背后是否牵涉到传统父权体制的经济剥削？还是大多数的小姐都可以创造有异于传统女人身体为男人（父亲、丈夫、情人等等）赚钱和父权资本经济体制的「自主」空间？

在论文结构上，论文辩证和后面十二个小姐的故事显然呈现一个理念上的断裂：论文想要赋呈现这些女人的能动力，摆脱「受害者叙述」的呈现模式，但是我们在这十二个故事里看到的，愉悦不是大多数这些小姐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家庭经济、金钱焦虑才是最大的原因。我必须不厌其烦地再提出阶级因素的重要性。所谓「好女孩、坏女孩」原是中产阶级价值体系产物。根据这些上班小姐自己叙述的故事来看，大多数这些女孩的家庭似乎并没有用这样一套道德观来看待上班赚钱的女儿，反而比较在意女儿钱赚得多不多？拿多少钱回家？够不够面子？等等问题显示讨论女人从事这个行业有没有「能动性」的问题，不能只看到情欲或小姐与客人性别关系的互动，这些小姐的阶级背景与她们在整个社会、家庭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个不可忽视的思考面向。

<迈向多元化教育视野下的性教育>除了副标题所提出的「教育就是性教育，性教育就是教育」的概念之外，这篇论文透过对教育体制的省思，还表达了两个重要的讯息：

- (一) 我们该扩充对性教育的认知范畴。学校的（性）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规划传授的性教育课程，更重要的恐怕是渗透在校园生活文化各层次的非正式「隐藏学程」。所谓的「隐藏学程」包括校园空间的性别化（男厕、女厕，男女宿舍区隔等等）、同侪的压力（例如学生集体对性少数的压迫、对「好女人」、「坏女人」的区分）、在学校生活的师生及学生之间被传递的性话题（如怀孕、性行为、性侵害的预防等等）。隐藏学程的无所不在，佐证了作者所说的「教育就是性教育」。学生在校园活动时，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有关性的价值、规范、认同、知识等等，不自觉地内化了许多有关性的隐含意识形

态讯息。

(二) 论文认为当前的性教育在卫道之士和所谓「妇女代言人」的主导之下，多用单一的价值观、道德尺寸、人生选择来塑造性的意识和实践。作者因而主张尊重多元差异的性教育，也就是「摆脱由卫教专家垄断的单向式灌输模式，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之间的价值冲突，而非淡化或迅速处理这些冲突」。

这篇论文和前一篇〈十二个上班小姐的故事〉有相近的理论架构：主流权威性言说 vs 被压抑的声音；专家学者 vs 弱勢的青少年；传统单一性言说 vs 颠覆性能动力的「多元性教育」。论文主张的「多元性性教育」当然隐含强烈的反对主流性言说的意味。作者认为，主流性言说往往强调性的负面，要求青少年「恪守严谨的性道德和性别角色规范」，「多元性性教育」要做的就是反制这样的性意识，帮助青少年以正面的态度面对他们的情欲人生。

这样说当然没错。结合负面的、强烈道德判断的性言说无所不在，时时刻刻规范监视个人的一举一动。要反制这股巨大的箝制力量，必须从青少年教育开始，建立对性较正面的态度，而不是一想到性就联想到肮脏、罪恶等等。但是，我却不认为，建设性的性教育应该强调性的愉悦，（我们真以为青少年傻到不知道性有欢娱的层面？只看到性的坏处？事实上，论文在谈论「隐藏学程」时就提及，传统性言说不见得只打压情欲，同时也在鼓动诱发情欲。传统性言说不见得如作者所呈现的那么单一，只在打压情欲、只在激发焦虑。）而避开避孕、意外怀孕的处理方法、性传染的防治途径等等相关知识的传授。如果传授这些知识，可能不引起青少年对性的焦虑吗？如果不应该避开这些性的「负面」问题不谈，而得知性有这些问题必须面对，青少年可能只享受性的欢娱而不感受到性带来的压力吗？主流性教育当然强调这些问题的处理。但是，谈这些问题就是对性在做负面的处理吗？性教育该对性采取建设性的正面态度。但是，在实践上究竟该如何落实这样的理念实践，我却觉得不

是光主张情欲解放就可以取消一切问题。

主流性言说针对青少年教育对象时，对性采取的防御性作法不见得只着眼于道德问题，这里恐怕更牵涉到经济层面的社会成本负担问题。也就是说，在性教育里偏重性的「恶果」（如传染性疾病、怀孕、堕胎的影响等等）恐怕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考虑到在青少年尚未有能力经济独立或对过早出生的婴儿负起应尽的责任。如果我们承认，青少年无法充分承担这些社会成本，那么，这些成本负担要转嫁到谁的身上？这跟社运团里上街头抗争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街头抗争少则一天，多则数星期即结束，社会的成本由大家分摊，比起抗争所可能得到的建设性改革，这样的社会成本值得花费。但是，我却可以想像，青少年性的成本大多来是由青少年的家庭——特别是女人来承担。这不是一个弱势个人或群体与强大主流社会的利益冲突，而是青少年与女人两个弱势团体的利益冲突。长远成本的负担和转嫁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一笔带过。

另外，激进性教育的主张者谈性教育认为性教育必须多元化，在实践上非威权式、由上而下的，而是以学生感受经验为主的。我当然也赞同教室课程设计必须多让学生发言，多面沟通，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认为学生的经验（如同前一篇论文里所强调的上班小姐「自己的声音」）必然是相对于威权或是比较有颠复的可能性，恐怕过于乐观。论文在讨论校园「隐藏课程」时就提到，学生群体文化往往有性别歧视，如划分好女孩、坏女孩；对「娘娘腔」的男人施加暴力等等。我想要强调的是，学生文化固然有反叛学者专家性言说的地方，但是，也不见得较不威权或是较具「非主流」价值取向。在此情况下，如何落实「多元教育」的内涵须要更严密的思考。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资料

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 / 何春蕤编 . -- 初
版 . -- 台北市 : 麦田出版 : 城邦文化发行 ,
2000 [民 89]
面 : 公分 . -- (麦田人文 : 35)
ISBN 957-469-020-2 (平装)

1. 性 -- 论文, 讲词等

544.707

89003932